

第二章

战后教育对战争认知的影响

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种体现方式。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教育制度是伴随社会发展并适应社会需求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新的民主教育制度是随着战后日本社会发展并适应战后社会需要而从战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制度改造过来的。日本教育从体制到内容的这种深刻变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战后战争认知理念的形成和变化。

第一节 战前法西斯教育体制回顾

日本古代教育制度的形成与中国儒学和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三世纪末的应神天皇时，百济人阿直岐、王仁来到日本，教皇太子学习儒家经典。这是日本宫廷教育的开始。此后，不断有来自百济的学者在当时宫廷设立的学问所教授太子及皇族子弟学习汉语和儒家经典。此时的学问所并非官学，只是皇家私设的内部教学机构。日本在大化改新前，没有建立系统的教育制度。从七世纪初开始，日本不断派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进行外交活动和学习中国文化。这些人回到日本后，就按照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积极推动日本的社会变革，即

“大化改新”。为了培养改新所需要的人才，当时积极推行改新的天智天皇（661—667年在位）和大武天皇（673—686年在位）分别在大津京、藤原京设立了大学寮。大学寮是模仿唐朝的国子监设立的官学机构，以培养官吏为目的。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即公元701年，《大宝律令》颁布实施。这个律令中有“学令”22条，比较详细地规定了日本的国家教育制度：京城设立一所大学寮，地方各“国”分别设立一所国学，都以培养官吏为目的；此外，在中央还设立典药寮、阴阳寮、雅乐寮等机构，负责各种专门性学科的教育。大学寮的主要课程是明经（儒家经典）、明法（法律）、纪传（历史）、音、书、算等学科，其中以明经科为主；国学的主要课程以纪传科为主。这种教育体制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大化改新所需的人才。大学寮和国学教育制度的实行，打破了当时的门阀制度，开辟了选拔人才的新途径。《大宝律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日本完整的贵族学校教育制度真正形成。

直到平安时代，日本才出现私学。828年，从唐朝学习归来的空海模仿中国的私塾形式开创综艺种智院，培养人才。此外，还有和气广世创立弘文院，藤原冬嗣创立劝学院，桔嘉智子创立学馆院等，私人讲学之风大盛。后来，也有一些大学教育在私邸进行讲学。平安后期，私塾形式的私学代替了官学，教育开始得到普及。德川时代，日本的教育还分为武士教育和庶民教育两大类。官学主要为武家子弟而设，平民的学校分为寺子屋、乡校和私塾。明治政府建立后，这种教育旧体制全面崩溃，基于平等原则的新的国民教育体制开始形成。

明治时期是日本近代公共教育制度的确立时期。明治政府把教育“文明开化”作为了振兴国家的三大政策之一，建立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体制。1871年7月，日本在中央国家机构中设置文部省，以加强对全国教育的领导。他们首先整顿旧有学校并

开设新学校：把东京的大学改称为大学本校（原昌平学校）、大学南校（原开成学校）、大学东校（原兵学校医学校），直辖文部省；在东京设置直辖的中小学；统管全国的原各府县管理的学校；设置直辖的官立女子学校。其次是改革学制。1872年颁布新学制：全国分为八个大学区，每区设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设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一所中学，共设256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划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一所小学，共设53760所小学。新学制还规定儿童六岁上学，小学分为上下两等，各为四年；中学分为上下两级，各为三年；大学负责培养专门人才，分设理学、化学、法学、医学和数理学五科。日本的这种学制在形式上是模仿法国，在教育内容上则是模仿美、英、法等国。由于严重脱离日本的实际情况，再加上教育经费缺乏，这种新学制只维持了七年便被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代替。

《教育令》是模仿美国的教育制度而制定的旨在实行自由主义的教育政策。教育令废除了学区制，规定每个町村或几个町村联合设立公立小学，小学学制从八年改为四年，并精简教学内容，使之实用化。这个教育令规定的教育体制也只是照搬了美国的教育模式，与日本的社会实际仍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执行，明治天皇就颁布了《教育大旨》，指出了全盘西化所产生的弊端，强调了教育继承传统道德和文化的重要性。1880年，文部省颁布了《改正教育令》，强调国家干预教育，反对国民参与教育行政。这期间，日本的自由民权思想非常活跃，许多人希望模仿世界大国、民主主义彻底的美国教育制度而迅速实现强国之梦。结果制定出来的一系列教育政策严重脱离了社会实际，导致社会上反对欧美化倾向思潮的出现，潜在的儒学思想和国学思想开始抬头。这也是政治上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开明派与以元田永孚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

1882年，日本以天皇敕谕的名义颁布了《幼学纲要》，强调了应在儿童中进行以“忠孝”、“仁义”等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要向儿童灌输尊皇爱国思想。这表明日本教育开始向国家主义方面转变。

甲午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虽得到了较快发展，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彻底，绝对权威的天皇制仍然存在，日本仍是一个带有封建军事专制性质的国家。专制政府必然要加强对国民的精神统治，必然要求教育为其统治服务。1886年三四月间，日本天皇以敕令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包括《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和《诸学校通则》等。这些法令总称为“学校令”。“学校令”以分别立法的形式，对大学、师范学校、中学、小学的学校制度做出了规定。“学校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日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起了国民教育制度，这在日本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令规定的学制系统是双轨制的。根据“学术研究”和“教育”分开的原则，这种教育体制规定，帝国大学是学术研究的机关，是培养英才（即能够从事近代技术工作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才）的场所。进入帝国大学的学生要经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严格考试选拔。双轨制的另一轨是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的学制一般是三至四年，要让儿童学会读写算的基本技能，小学教育特别强调“道德教育”，注重对学生进行忠君爱国思想教育。这种双轨制教育体系就是二战前日本的国家教育体制。即小学——中学——高等中学——帝国大学；小学——中等职业学校。

在内容上，强调了教育为国家振兴服务，强调了对学生进行天皇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的灌输。为此，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为了使文教政策统一到专制政治下，颁布了日本的教育方针《教育敕语》，全文如下：

朕，念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也。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望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辟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则不独可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以显彰尔先祖之遗风。

斯道，实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使之通古今而不谬，施中外而不悖。朕愿与尔臣民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明治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

御名 御玺

《教育敕语》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求日本国民应树立“国体”意识，日本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忠良臣民”。《教育敕语》理论基础是日本传统的国家理念，即日本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国体。《教育敕语》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日本的“忠良臣民”必须严格履行以下三个方面的道德：一是坚持儒教伦理道德；二是必须忠实服务于国家；三是必须接受神道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思想。

从1890年10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5年间，《教育敕语》成为了日本国民道德和精神的依托。“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就是提倡重视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方面的关系，是遵守儒家伦理，是“私德”；“常重国宪遵国法”是要求国民遵守的“公德”。“敕语”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求国民必须具有“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的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思想。可

以说,无论是“私德”还是“公德”,都是专制政权统一、禁锢国民思想的工具。《教育敕语》是日本教育的最高纲领,它的实施,标志着二战前日本国家教育体制的最终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专制政府一方面压制进步自由思想,另一方面继续强化这种国家主义的臣民教育体制。1917年9月,日本政府在内阁中设立了“临时教育会议”,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教育咨询机构。“临时教育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复古的家族主义国家观,即天皇意识。这与《教育敕语》的国家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随着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完善,日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得到了发展。

学校教育方面,日本政府非常重视中小学教育,同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大正初期,日本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5%左右。大学教育方面,除了官办的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京城、九州等六所帝国大学外,还允许开办私立大学。当时著名的私立大学有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国学院大学等。日本大学的数量从1918年的六所增加到了1929年的46所。此外,师范学校、各种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等均有很大发展。

社会教育方面,日本政府加强了新闻、出版、广播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管理。大正时代的报刊已有相当的规模,除了《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四大报纸外,各都、道、府、县都有各自的地方报纸;有《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等综合性杂志。图书馆和博物馆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有东京帝国图书馆、大阪府图书馆等;有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等。日本还在1925年(大正14年)建立起了自己的广播网,促进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教育内容上,日本专制政府从昭和前期就加强了皇国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灌输。首先,在学校教育中,

日本政府使《教育敕语》神圣化。每天，校长要带着白手套毕恭毕敬地捧读它，学生要恭恭敬敬地低头聆听。各学校要求学生三年级时能够准确背诵，四年级时能够准确默写。通过这种专制化的强制教育形式，日本国民对《教育敕语》越来越尊崇。《教育敕语》逐渐成为一种国家精神的象征。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随着对外侵略政策的实施，日本的法西斯统治体制迅速确立，同时，日本教育也变成了法西斯教育，成为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工具。从1931年开始，日本法西斯政府大力鼓吹所谓国粹主义，并从“思想国防”的理论出发，把“明确国体教育”的思想体系化、制度化。1931年7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学生思想问题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加强法西斯教育思想的灌输。1932年，该委员会炮制了一个咨询报告，要求学术界和思想界要“认识到日本的独特性，从理论上阐明国体观念，大力研究固有文化，高唱理想主义”。1932年8月，文部省又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加强了对所谓国体理论、国民精神的宣扬；文部省还把学生部升格为“思想局”，千方百计对广大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日本政府还以否定“天皇机关说”为契机，把整个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彻底军国主义化、法西斯主义化。1935年8月5日，日本内阁发表了“关于明确国体的声明”。“声明”表示：“日本国体，是依照天孙降临之际下赐的神敕昭示，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国家，宝祚之隆与天地无穷……若夫统治权不存于天皇，天皇为行使机关所说，则完全歪曲了万邦无比我国体之本义。”^①这个“声明”的发表，不仅彻底否定了

^① 宫原诚一等：《资料·日本现代教育史》，第四辑（战前），三省堂1974年版，第283页。

“天皇机关说”，而且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控制体制的形成，也表明了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完全成熟。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上台后，就以政府命令的形式把“明确国体”作为日本教育的指导思想。1937年3月，文部省编撰发行了《国体之本义》，作为改革教育的基准，也是作为向全体日本国民进行“国体”思想教育的教科书。《国体之本义》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一本“圣书”，要求每个日本国民都必须毕恭毕敬地去拜读、背诵、实践，要按照书中的精神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国体之本义》运用了大量日本神话、典故与所谓国家有机体说相联系，并故意用一种神秘的表现手法，来阐明所谓日本的“天皇国体”的“辉煌”、“伟大”。下面摘引一部分：

第一大日本帝国

一、肇国

大日本帝国拥戴万世一系之天皇，信奉皇祖的神动，永远统治之。此乃我万古不变之国体，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万众一心拥戴圣旨，好好发挥忠孝之美德，这就是我国体精华之所在。此国体是我国永远不变之根本，贯彻国史，炳如光辉，随国家的发展而巩固，与天壤（天地）一起而无穷。我等首先必须知道在我肇国之事实中，此基础如何大放光辉。

我肇国乃存在于皇祖天照大神把神敕授予皇孙琼琼杵、降临丰苇原之瑞穗国（日本）之时。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在讲述皇祖开国之事时，首先叙述了开天辟地、修理巩固之事。古事记中写道：开天辟地之时，高天原形成天之御中主神，其次是高御产巢日神，再次是神产巢日神。这三位神都

是独立之神，隐身。在日本书纪中……

在如此长的引用文之后，得出了结论：

始于如此悠久深远之肇国事实，与天地一起无穷地生成发展，真实地显现了万邦无比之一大盛事。

这就是《国体之本义》所说的“国体”。它要求日本国民必须无比忠诚于这种“国体”，要“忠君爱国”、“忠孝一体”，要绝对忠诚于天皇，即忠诚于以天皇为首的法西斯专制政府，忠诚于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国体之本义》更要求日本的教育严格遵循《教育敕语》的精神，对全体学生进行“皇国”史观教育，培养学生忠实天皇、忠实专制政府的思想，目的就是要全体日本国民培养成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工具。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七七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教育也随即实行战时体制，教育思想完全变成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1937年8月，近卫内阁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把“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作为所谓国民精神灌输给民众。1937年12月又成立了教育审议会。这个机构根据侵略战争的需要，按照《国体之本义》的精神，从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观点出发，对日本教育内容、制度和方法等进行了全面改造，进一步强化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教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继续强化皇国主义、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各级学校都要把培养学生的“归一皇国之道”（国民学校）、“修皇国之道”（初中、高中）、“基于皇国之道”（大学）当做最高目标。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日本的各级学校变成了学生磨炼“皇国之道”的训练场。

所；二是把教育内容全面改造为符合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需要的课程。如修身科由原来的“忠孝一体”的公私道德融合说，改为只强调“忠一体”的国家道德，把“用生命全忠”作为“第一孝行”。国史科也是以神国、皇国观念出发，强调认识“东亚及世界”的超国家主义的反动侵略思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教育达到了极点，整个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充斥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皇国观念，充斥着所谓日本精神的理论。当时的学校教育更是彻头彻尾的所谓的“灭私奉公”、“实践臣道”的教育。

日本学者若槻泰雄在他的《日本的战争责任》一书中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日本法西斯社会教育的：“始于精神总动员运动时对国民的‘指导’、‘干涉’，随着战争的进展而加强了。在广播方面，全年广播‘伟人’的说教，清除软弱无力的歌曲，选定‘国民歌曲’和‘国民唱歌’每天进行广播，国民歌谣的首次播发始于1936年6月1日，题名是《日本好国家》。在国民唱歌方面，始于1937年10月13日。后来长期唱的歌是《走向大海》。在车站经常可见许多肩上斜挂着带子的‘国防妇女会’的成员；男人在不同场合被半强制地身着‘国民服’，这是一种像文职军人或随军壮丁那样难看的‘制服’。女子身着裙裤，还是后来的事。到处可见张贴着‘奢侈是敌人’、‘不要烫发’等宣传画。”“身穿‘国民服’的相声演员在台上向观众说教‘时局的严重性’和‘生活态度’，处在配给机构基层的菜店老板也要对为得到配给而集合起来的主妇们进行‘一场训示’。町会长和街坊互助组长在町集会上，都要把报纸上写的事，得意扬扬地高谈阔论一番。”^①

^① 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294页。

可以看出,日本法西斯当局把这种所谓的“国体”意识教育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1944年10月5日,日本法西斯政府为了挽回败局,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做出了《决战舆论指导方策纲要》,规定“舆论指导要彻底贯彻维护国体的精神”,“唤起提高对国体的信仰”。

从日本国家教育体制形成的过程来看,日本是把教育作为实现“富国强兵”和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日本的教育指导思想——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也是在经过了明治初期和中期的西洋化与日本化的斗争后逐步形成的。这种教育指导思想伴随着日本法西斯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后,又成为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教化臣民的精神工具,不仅给日本人民本身,更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第二节 战后日本教育发展

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在对日本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同时,也对日本的法西斯教育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造。这次的教育改革,是以美国的民主教育制度为模式,以铲除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中的极端国家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毒素为目的,以实现教育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为宗旨而进行的。这次教育改革,是日本教育史上第二次重大改革。

大日本帝国在战争中溃败,这一严酷的事实对长期接受“天皇制国体”思想教育的日本人来说,简直像一场噩梦。日本国民接受的教育一直是“武运长久”、“皇祖护佑”、“皇国不灭”的观念,现在,他们听到了一直被奉为神灵的天皇宣布关于停战投降诏书的广播,一下子傻了,不知如何是好。1945年9月,保守的文部省发布了《建设新日本的教育方针》。这个“方针”共11

条。第一条阐明的日本今后的教育目标为“日益努力捍卫国体，同时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思想和政策，以建设和平国家为目标……”这显然是一份思想混乱的纲领，一方面强调要努力捍卫国体，另一方面又在高唱铲除军国主义思想。这充分说明日本政府在当时还抱住业已死亡的旧教育体系不放。如此指导思想，既不符合美国占领军的意图，也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愿望。

针对这种局面，美国占领军发布了一系列指令，敦促日本政府应彻底根除教育中的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在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专制教育体制，以保证教育民主化改革的顺利进行。

1945年10月22日，就在文部省还沉醉在“奉诏必谨”、死守《教育敕语》不放的时候，占领军总部向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的指令，对当前日本的教育内容、教育工作者和教学科目、教材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要求日本政府对教育内容严格审查、修订，“剔除教学课程和教材中的军国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内容”，明确规定“禁止散布军国主义的和极端的国家主义思想，废除军事性教育和军事训练项目”，“要建立符合议会政治、国际和平和基本人权思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要求对所有教育机构中的教职员工进行审查，极据审查结果做出留任、退職、复职、任命、再教育或转职的处理。

为了使这项政策能够得到切实执行，占领军总部又先后颁布了《关于教员和教育行政官员的资格审查、任免的备忘录》、《关于废止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所进行的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及弘扬活动的备忘录》和《关于停止修身课、日本历史和地理课的备忘录》。这三个备忘录和前面颁布的管理政策被称为占领军的教育改革“四大指令”。

《关于教员和教育行政官员的资格审查、任免的备忘录》要

求在文部省内设立教职员调查机构，对教员及文教行政人员进行审查，开除具有军国主义、过激的国家主义思想和不服从占领政策的教员和教育行政官员，同时还规定禁止复员军人到学校任职，还规定要为过去曾遭受军国主义分子迫害而被迫离开校园的教师平反，邀请他们回学校复职，重登讲坛。

《关于废止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所进行的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及弘扬活动的备忘录》则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长期以来利用国家神道宗教欺骗人民，为自己的战争目的服务。为防止这类现象重演，必须立即停止国家对神道宗教的扶植和支持，禁止所有“全部或部分由公款开支的教育机构教授有关神道的教义；禁止颁布、解说、评注战争期间文部省编撰和颁发的《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等文件，要把日本国民从国家强制规定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中解放出来，使和平民主思想在日本人民心中扎根；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大东亚战争”、“八纮一宇”等带有煽动性的词句。

《关于停止修身课、日本历史和地理课的备忘录》明确命令立即停止教授充满军国主义毒素和迷信神道色彩的修身课、日本历史课和日本地理课，废止与上述课程有关的法令、规则、训令，收回全部教科书和教师使用的教学参考书，并加以销毁。

上述四大指令的贯彻执行，彻底摧毁了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教育体制。紧接着，为了在日本建立起民主教育体制，真正实现日本战后教育的民主化改革目标，占领军司令部请求美国政府派遣由教育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实地考察，为日本教育民主化改革提供建议，为日本战后教育发展设计远景规划。1946年3月6日，以乔治·D. 斯图达德（George D. Stoddard）为团长，由大学校长、地方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学、心理学专家组成的教育使节团一行27人到达日本。代表团深入到日本各地，详细调

查日本的教育实际情况，认真听取学校教师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意见，在日本教育委员会的协助下，用了二十多天，就完成了《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并于3月31日提交给了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

《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在绪论部分中尖锐批判了二战结束前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划一主义弊端。报告认为，划一主义教育把个人置于整体之中，使个体精神受到致命打击而窒息。报告指出，战后重建的日本教育应当承认个人的价值，应当遵循发展个人能力和培养个性的教育原理；应当创造自由的教育空间，让教师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让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发展；应当确立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建立向所有的男女青年开放的、新的教育组织。“报告书”的主旨就是希望日本能够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自由和平等的教育体制。

“报告书”的本论部分则详细阐明了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其要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教育目的问题。报告书指出，建立民主制度下的新教育制度的原则应是以尊重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为基础，“促使每个人作为富有理解力、重视责任、与他人合作的社会一员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新的教育制度是以尊重和发展学生的个性为目的。（2）关于教育行政管理问题。报告书指出，应改革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制度，实行地方分权。也就是把过去文部省的对课程、教学法、教材及人事管理等各项权力下放给各都道府县和地方学校，废除对学校进行强制性统治的视学官制度。报告书还建议在都道府县设立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的、由代议公民组成的教育委员会，建议在市町村设立由选举产生的教育行政机构，依法对地方的初级学校和中等学校进行管理。（3）关于学制问题。报告书建议新的教育制度中，小学为六年制，初中三年制，高中三年制，均为免费教育。

每个公民 16 岁前享受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阶段），实行男女同校制度。（4）关于高等教育问题。报告书建议，应改变职业色彩过强，专业化程度过早，知识面过于狭窄的状况，加强基础课程教学；应通过建立课程自由化选修机制，把普通教育的基础课程引入到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应在高等教育机构间设立协会组织，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以达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目的；还应建立教授会、学生会等组织，以实现大学自治；应采取措施，保证学者的学术研究自由；大学应向女生和一般成人开放。（5）关于成人教育问题。报告书建议，应制定广泛的成人教育计划，对现行的成人教育发展规划给予相应的援助和指导；应提高独立设置的成人教育机构的威信，使其民主化，增强办学活力；各级学校应开设夜校部，应加强学校与学生家长的联系，学校应向讨论、集会形式的成人教育开放校舍等。（6）关于教师培养问题。应把师范学校升格为师范大学，实施教师专业与普通高等教育专业相结合的课程体系，也应设法在单科专门大学和综合大学中培养教师和教育职员；应制定教师再教育计划，对教师进行再培训，应利用教师的集会、讲习会和协会、观摩教学、举办函授讲座等方式对教师进行在职教育；应改善教师的待遇。（7）应改革日本“国语”（日语），使其更容易掌握。

《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是按照美国的民主教育模式对日本战后教育体制改造提出建议的。“报告书”虽然是以“建议”的面目出现的，没有法律效用，但对转变日本战后的教育思想起到了巨大作用，是日本教育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事件。但这个报告书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就是对《教育敕语》持暧昧态度。报告书只要求停止举行捧读《教育敕语》的仪式，对敕语本身没有评价。这反映了美国既想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的根基，又想保留天皇以利于美国占领政策的实施的矛盾态度。

美国教育使节团关于改革日本教育的建议，受到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1946年5月15日，文部省制定的《新教育方针》就充分尊重了“报告书”的精神，提出了实现教育民主化的五大目标：实现教育制度民主化；实现教育内容民主化；平等地尊重学生的人格，实行适应个性的教育；进行独立自主、合作协调的生活与学习训练；加强教师自身的民主化修养。6月，日本众参两院分别做出了关于排（废）除《教育敕语》的决议，同时责成文部省发出通知要求各学校贯彻决议，并负责收缴《教育敕语》影印件。众参两院对文部省的态度进行了批判：“已经过了时的公文——《教育敕语》、赐给陆军军人敕谕及其他有关教育的敕语，至今仍被人们误解，认为还是继续拥有指导国民道德原理性质的文书，这完全是因行政措施不得力所致。”这样，影响制约日本国民教育理念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教育敕语》就退出了日本教育发展的舞台。

1946年8月9日，日本政府公布实行“教育刷新委员会官制”，并据此成立了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教育刷新委员会”。这个机构的职责就是根据“报告书”的精神，制定日本教育的根本方针和实施办法。11月，日本新宪法《日本国宪法》颁布，新宪法明确规定日本人民冀望永久的和平，以建立民主化国家为目的，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福利做贡献。这也是日本战后教育的根本原则。12月27日，教育刷新委员会向内阁总理大臣提交了“关于教育的理念及教育基本法”、“关于学制”、“关于私立学校”的建议文稿。这些建议文稿成为了文部省制定教育法草案的基本框架。教育基本法草案经占领军总部审查后交由议会审议通过。这样，1947年，日本颁布了《教育基本法》。

《教育基本法》在前言中规定了日本教育应为“建设既有民主又有文化的国家，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福利事业做出贡献”，“培

养注重个人尊严并追求真理和爱好和平的人才”的思想，以及正文中规定的教育目的、方针、机会均等原则等，与《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具有很大的—致性。《教育基本法》明确规定了日本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宗旨与基本原则，是战后日本教育最基本的法律，具有“教育宪法”的性质。这部法律的制定实施为确立日本战后民主教育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为了使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精神能够在学校教育中得到彻底贯彻执行，并推动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尽快建立，日本政府又在1947年3月颁布了《学校教育法》，在1948年7月颁布了《教育委员会法》。根据《学校教育法》规定，日本二战结束前的八年制小学教育改为六年制，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三年制初中教育，小学和初中为义务教育，实行男女同校制；在初中之上设三年制高中，分全日制和定时制，进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四年制大学为主体，也有三年或五年的学制。教师的培养在综合大学或单科大学里进行。这就是战后日本建立的六三三四制学校教育体系。这个学制体系和教师培养制度，是模仿美国的教育模式而建立的。

通过一系列教育法律的颁布实施及美国占领军的督导，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法西斯专制教育体制逐步被铲除，民主化教育制度稳步建立。《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等法律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民主化思想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体现了平等的教育权利和义务。日本新宪法的第26条明确规定了每个日本国民具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也具有使其受保护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这就是国民的教育权。

其次，体现了以追求民主、和平为最高价值的教育目的。《教育基本法》表明了日本的教育是具有“建设既有民主又有文化的国家，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福利事业做出贡献”的崇高目标

的。这个崇高目标是应当通过教育“培养注重个人尊严并追求真理和爱好和平的人才”来实现。日本的教育目的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制定的，那就是：“教育必须以完成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作为和平的国家及社会的建设者，爱好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的价值，注重劳动与责任，充满独立自主精神的身心健康的国民。”（《教育基本法》第一条）

第三，体现了学术自由和教育自主性的特点。日本新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和学术自由都应给予保障。《教育基本法》也把“尊重学术自由，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培养进取精神并相互尊敬和合作，努力为创造和发展文化做出贡献”当做教育目标之一。

第四，体现了教育体系单轨化和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日本新宪法的第26条明确规定了国民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教育基本法》的第3条对此又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全体国民享有与其能力相应的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在受教育上不能因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经济地位、门第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教育基本法》的第四条（义务教育）和第五条（男女同校）也是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的规定。《学校教育法》所确定的“六三三四”学制体系，从制度上消除了二战结束前的中等以上教育双轨制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弊端。

第五，体现了教育行政独立性的特点。《教育基本法》规定，教育行政应当“直接对全体国民负责，不服从不当的支配”。《教育委员会法》更把保证“教育的独立性”、地方分权化、尊重“公正的民意”作为教育行政的三项基本原则。这从法律制度上铲除了二战结束以前教育行政不民主的“敕令主义”、“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

在一系列体现着民主精神的教育法律指导下，日本的教育改

革和学校制度转轨进行得十分迅速。1947年,日本实现了新的初中学制,1948年和1949年分别实现了新的高中学制和新的大学学制。到1950年,日本战后新教育体制基本形成。

日本战后的教育民主化改革是依据美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而进行的。这次教育改革彻底铲除了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体制,消除了专制主义的教育思想。同时,改革在制度层面上体现了注重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强调“教育机会均等”原则、取消了划一性教育而重视个性教育的特点;在思想层面上体现了发扬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强调尊重个人尊严、强调培养爱好真理与和平的人等特点。这场教育民主化改革符合了广大日本人民的愿望,适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对促进战后日本社会进步和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历史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1950年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冷战局面的形成,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占领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教育思想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美国要求日本自卫队扩大规模,增强军事力量政策的出现,日本政府开始提倡以所谓“爱国心”教育为核心的道德教育,这实际上是日本的保守势力变相恢复战前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种表现。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政府又派出了第二次教育使节团对日本进行访问,其目的是为了对上一次教育使节团建议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对日本教育问题进行研究。使节团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向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又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从美国当时的国家政策出发,明确提出“在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是日本受到启发的选民”,并指出日本的教育应加强“道德教育与精神教育”。1952年9月,吉田首相在自由党总会上发言,明确表示要把“爱国心”当做重

整军备之精神基础的思想。政府和文部省大力宣扬“爱国心”教育的行为给日本的道德教育带来了很大影响。1955年，经安藤正纯文相亲自修改的社会科学学习指导纲要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个纲要否认“国民主权”的民主思想，强调“象征天皇制”，把“天皇”、“宗教”、“国家庆祝日”等作为重要内容。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政府更加重视道德教育，1958年的课程改革就特别设置了道德时间。1966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的咨询报告《所期望的人》更是强调了要加强国家主义思想教育。虽然这种思潮遭到了许多国民和舆论的反对，但对以后日本教育思想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1968—1970年进行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修订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此后，日本政府始终把加强道德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又把强化“爱国心”教育作为重中之重，如1989年的课程改革，就规定了日本的中小学入学仪式和毕业典礼上必须升“日丸旗”和齐唱《君之代》，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爱国心”教育，强化学生的国家观念。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以1951年11月“政令改正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咨询报告》为开端，开始否认教育的“国民主权”，强调所谓“国家主权”，加强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推行新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1954年2月，吉田内阁提交通过了《关于确实保证义务教育诸学校中教育的政治性中立的法案》和《部分修改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法案》，强化了对公立学校教职员工的管理。1956年6月，鸠山内阁颁布了《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的组织及运营的法律》，把原来教育委员的公选制改为任命制。此后，文部省进一步强化了教育行政管理权，加强了教育事业的管理和计划，主要措施有：实施教师工作评定制度；教科书审定严格化；全面修改“学习指导纲要”使其标准化和法

律化。这些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是教育民主改革后重新向国家控制教育的体制的修正,是强调“教育权属于国家”思想重新出现在教育管理体制中的一种表现。

日本政府在加强教育管理的同时,也不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促进了日本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日本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是与日本社会 and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也开始暴露。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又开始了“第三次教育改革”。

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特别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强调教育的投资价值和经济效益。1962年,日本政府发表的《教育白皮书》指出,“教育投资的成果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投了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①在这种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日本教育经费总额从1960年的6124.9亿日元增加到了1970年的28843.7亿日元,十年增加了3.7倍,大大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但是,随着日本社会和经济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教育投资论”、“能力主义”的教育发展理念逐渐渗透到了社会和国民的意识中,学校教育出现了过分强调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学生的道德教育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高度重视。学生机械地接受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单纯的“授受”关系。同时,“学历主义”、“考试战争”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升学竞争中落伍的“非行”(违反校规和社会公德的行为)青少年大量增加。面对这种情况,日本的教育家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出了防止“教育荒废”、

^① 帝国地方行政学会编:《日本的经济发展与教育》,1962年,第17页。

挽救“教育危机”的呼吁。他们认为，必须对日本教育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价，进行新的改革。

面对新的课题，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用了四年的时间，于1971年提出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整顿的基本施策》的咨询报告。报告指出日本应进行“第三次教育改革”。

针对日本教育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必须进行改革。但在如何进行改革上产生了分歧。政府方面认为，战后日本教育过分模仿美国教育制度，忽略了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以“日教组”^①为代表的民间教育团体则认为，战后教育改革对战前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进行了清算，是基本正确的。

这样，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只在幼儿教育、中小学课程设置、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的某些方面得到过部分实施。然而，教育改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教育改革作为国家的教育构想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这次教育改革是以国际上最先进的“终身教育”理论为指导，根据日本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日本教育思想到教育体制全面展开的。改革的目标是要在日本建立起“学习化社会”。

中曾根内阁把教育改革当做任期内的三大改革任务之一。在1983年12月提出了教育改革的设想：重新审查现行的六三三四学制，要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革；改革初中升高中的人入学考试制度，使之多样化、灵活化；改革国立、公立大学统一入学考试制度；重视社会服务和劳动教育；重视道德情操教育；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外语教育，以适应国际化时代的要求；提高教师素质，加强师资培训工作。1984年，中曾根内阁成立了一个直属首相

^① 日本民间教育团体，全称为“日本教职员组合”（日本教师联合会）。1947年6月成立，有会员六十余万人。

的教育改革咨询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临教审）。“临教审”在首次咨询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教育“改革基本想法”：重视个性原则；重视基础与基本知识；培养创造性、思考力、表现力；增加选择的机会；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改善环境教育；适应国际化；适应情报化。1987年，“临教审”在第四次咨询报告中又提出了建设“又工作又学习的社会”，即“终身学习社会”的思想，建议教育改革应“改变以学校为中心的观点，谋求综合地重新组成以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为主轴的新教育体系”，应当“完善终身学习体制”。日本政府完全采纳这个建议，并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于1990年6月颁布了《关于完善振兴终身学习措施的推进体制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国家、各都道府县以及市町村要共同协作以振兴终身学习。这样，日本在全国范围内逐步确立了终身教育体系。

日本的第三次教育改革与明治时期的教育改革及二战后初期的改革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两次教育改革都是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而第三次教育改革是为了适应面向21世纪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建立终身教育体系的教育革命。通过改革，日本的教育迈向了现代化，现代化的教育又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全局发展。

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在重视个性化原则、国际化原则、多样化原则和信息化原则的前提下，还高度重视了道德教育。

首先，把德育放在了重要位置。“临教审”在第一次咨询报告中就特别强调了德育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强调了为了实现21世纪的教育目标必须振兴道德教育，他们把“智德体”三育的顺序改为了“德智体”，以突出德育的重要地位。

其次，重新修订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充实道德教育。1989年，文部省颁布了重新修订的《学习指导要领》。修改后的

“要领”，强调了必须充实和加强道德教育，强调了应全面展开重视个性、重视基础的教育，强调了应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强调了应加强促进国际理解与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教育。在修改后道德教育内容中，“要领”特别强调了爱国主义教育，如要求通过国际体育比赛及历史、地理的学习，加强对“国旗、国歌”意义的指导理解；规定在小学、初中、高中的入学和毕业仪式上必须升国旗，唱国歌，并作为一项义务来执行。在音乐科目中，新开列了一长串必须教授、必须会唱的歌曲目录，其中不少是有争议的曲目，即在二战期间鼓吹军国主义或提倡“忠君爱国”的东西。尽管有人提出异议，但文部省以强调教育应“增加在国际社会中生存的日本人的涵养”为由，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把这一切都制度化了。

《学习指导要领》修改最大的地方就是对社会科的改革。曾被认为是战后教育改革最大成果和象征的社会课，在此次改革中被极大弱化了。首先是把小学一二年级中的社会科与理科合并为“生活课”，把初中社会课的必修改为选修；在高中则废除社会课，另设“历史、地理”与“公民”两门新课。改革的目的是从教学内容上可以看出，就是为了加强学生的道德观念、生活习惯方面的教育。其次，修改后的“要领”所增加的道德教育新内容，主要是强调要培养学生具有爱国心、能够尊敬师长、对天皇要理解和敬爱等。这些新增加的道德教育内容，有的目标比较明确，有的则态度暧昧、令人费解。如强调“要加强对超越人类力量之物的敬畏之心”等条目就是如此，这明显是要教育学生从小就要敬畏所谓“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日本的历史教育历来是以人物为中心，以圣人、神人统治者为基调、为主线展开的。这次修改后的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历史教科书共列举了日本历史从3世纪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到现代的野口英世等42位历史著名

人物。与过去不同的是本次修改添加了东乡平八郎这个人物。东乡曾任日本海军“浪速号”舰长，是他发出了击沉“高升号”的命令，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此人以后又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亲自指挥了日本海大海战。他是一个典型的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分子。可见，日本当代德育教育中的某些内容与战后被铲除的军国主义思想还是有联系的。

文部省不仅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了修改，还向各都道府县及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和各中小学发出通知，统一颁发了作为教师用的正式教材——《道德教育指导提纲》及录像带。战后，由文部省统一颁发道德教育教材，这是第一次。

此外，还根据各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能力不同，规定了不同的道德教育内容重点，并增加了道德教育的有关经费预算。为了使道德教育能够更有针对性，文部省还多次进行了有关道德教育的调查。

由于政府采取了加强道德教育有关措施，日本青少年的道德面貌在20世纪后期有了很大改观。据文部省1987年调查，日本学校内的暴力事件、逃学、自杀的人数在不断减少，欺侮弱小同学的事件也大幅度下降。

现在，日本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教育网络，现代化的教育正为日本国民建设自己的国家发挥着巨大作用。

第三节 基于战后教育影响的战争认知评价

应当讲，战后日本战争认知理念的形成与教育的改革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战后，日本教育进行了民主化改革，铲除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国家教育体制，确立了以发扬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和促进国际和平为宗旨的带有美国教育特点的教育体制。民主化的

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使日本国民摆脱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控制。崇尚个性的教育模式,为日本国民实现自我价值开创了道路。但是,日本战后教育,尤其是第三次教育改革后,在道德教育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与战前教育思想相关联的地方。战后的两次教育改革,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教育内容,都与如何对待战前的教育体制和内容有关。因此,日本国民的战争认知与战后教育改革发展密切相连。

第一,美国模式的教育与国民对侵略战争态度暧昧的影响。客观地讲,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及其占领军对铲除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态度是坚决的。美国军队是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管制的目的就是:“(1)根绝日本的战争能力和军国主义;(2)通过民主化改革使日本成为世界国家中的一员。”^①美国是以坚决的态度对日本整个社会进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的,教育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向日本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指令,要求日本政府彻底根除教育领域中的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铲除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体制。面对美国政府及其占领军的坚决态度,日本政府中的一些人却是以暧昧的态度对待战前的法西斯国家教育体制及其理论基础“国体”观念。如1945年9月15日,文部省发表的《建立新日本的教育方针》还在鼓吹要维护“国体”、维护《教育敕语》。1946年2月21日,文部省学校教育局长田中耕太郎在地方教学课长会议上还在宣扬要拥护《教育敕语》的主张。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发布了“四大法令”,并派来美国教育使节团给予指导。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及其占领军的坚决态度和严厉措施,才使遭受法西斯军国主义毒害深

^① 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26页。

重的日本社会和教育走上了民主主义道路。在美国政府及其占领军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和国民逐步认识到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和思想给日本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逐渐由被动到主动,开始自觉地进行铲除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和思想的工作。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的努力,日本顽固的军国主义教育体制才会被铲除,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才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时大多数日本国民是支持美国占领军的政策,也认识到了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灾难。

然而,铲除法西斯军国主义毒素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美国政府就根据自己的国际战略改变了对日政策。由于冷战局面的出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不再关心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影响是否消除,而是设法把日本变成自己的永久军事基地,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前沿堡垒。这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教育领域的保守势力抬头,道德教育中出现了许多与战前极端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内容相似的东西,而此时美国并不关心这些了,而是主张在日本教育中开展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这从第二次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报告内容上就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及其占领军对民主思想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认识态度,对日本国民,尤其对日本广大学生的战争认识产生了混乱影响。美国与日本政府则达成了一致,日本积极支持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同时在国内严厉镇压共产主义和其他进步思想。而这时许多正直的日本国民则强烈反对美国占领军和政府当局的这种做法,如当时“日教组”就坚决反对政府对教育的控制行为。

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是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深受美国教育思想影响和模仿美国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战后日本教育体制,自然与美国的政策保持一定的一致性。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顺利实施及日美实现单独媾和,日本成

为了美国在亚洲的忠实盟友。美国是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日本也紧随其后。二战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方的中国、朝鲜等国家取得了胜利，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当然也是日本政府极力反对的。日本教育改革出现的“继承日本传统文化”、“培养爱国心”等包含美化军国主义、灌输皇国史观的倾向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日本教育实施的这些措施，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国民感受美国占领的耻辱，而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在美国看来，对抗共产主义思潮，就是与美国的冷战政策保持一致，在亚洲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所以，日本教育中的保守势力抬头和国家主义思想回潮是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与日本战后的美国式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持久争论与国民战争认知之间的关系。日本战后教育虽然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但是，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也是一直不断。这就造成了日本战后的学校道德教育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这种不稳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形式不稳定。战后初期的道德教育是按照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指令，废除所有与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有联系的思想道德教育方式，包括学校举行的各种有关仪式、各种教学工具、教材等。但是，随着战后教育的发展，特别是第三次教育改革后，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形式不断改变，许多在战后初期被废除的道德教育形式逐步得到了恢复。如在入学或毕业典礼上升国旗“日丸旗”和唱国歌《君之代》。对此，日本国民一直处在争论中，这是因为日本战后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国旗、国歌的地位，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在二战期间，日本的国旗、国歌曾给各国人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自从文部省发出通知要求各学校在节日和重要活动中都要升国旗、唱国歌后，在对用何种方式加强学生的道

德教育上,混乱认识的情况再度加剧。并且,有很多学校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个规定。据日本全国小学校长会1988年汇总“国旗、国歌”的指导实况调查结果显示,在入学仪式上升国旗、唱国歌的小学只占其学校总数的36%,在毕业典礼上升国旗、唱国歌的学校占总校数的79%。道德教育形式的不稳定和不统一,以及不断恢复曾被废除了的战前的一些道德教育形式,自然会造成人们对那场战争认知态度和认知理念的混乱。

另一方面,战后日本道德教育的思想内容不断改变,并不断引起争议。战后初期,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的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合作思想,要求学生认清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危害并与之划清界限。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政府又逐步开设了与战前道德教育内容极为相似的“爱国心”教育。1951年11月,当时的文部大臣天野发表了《国民实践要领》。该“要领”罗列了日本人作为个人、家庭成员、社会及国家成员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其中,关于“爱国心”和“天皇”的思想尤为引人注目。从此,日本道德教育的内容中不断被加进一些带有战前极端国家主义色彩的成分。1966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的咨询报告《所期望的人》就明确强调日本国民应忠诚于天皇,忠于天皇就是爱国。这实际上就是要恢复被废除的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德教育思想。这个报告虽然遭到了舆论的强烈反对,未能获得法律效能,但表现出来的“爱公司”、“爱国家”等思想受到了以财界为首的保守人士的热烈欢迎。第三次教育改革后,日本道德教育的内容更是强调了爱国主义教育,但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方面与战前的极端国家主义道德教育内容相似。从整体上看,日本战后的学校道德教育始终没有处理好继承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日本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日本的民族传统中确实存在着大量值得当代人认真学习和继承的优秀成分。但是,由

于明治维新后的军国主义分子用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民族传统肆意曲解，这造成了日本国民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情形依然存在。这也是造成日本学校思想道德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主要原因。

战后日本思想道德教育领域始终存在着争论，按理说，越争论应该对这个问题形成统一认识就越有利，然而，在日本出现的这种争论始终没有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始终没有放在本质问题上。可以看到，在每次争论中，无论是政府方面，还是所谓的国民代表方面；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所谓革新派，双方从未就什么是传统、什么是日本传统做过正面交锋，都是一方制定出政策或提出观点，另一方则加以批判，并且依据的理论往往都是陈旧的理论。由于双方对某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观点，所以争论的结果往往是更加不明确。如第三次教育改革时，中曾根内阁在1984年指令“临教审”提出了“改革基本想法”，而社会党和“日教组”立刻出来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政治权利直接进入教育的表现”，“有侵犯教育的政治中立性的危险”。^①而他们提出的三条改革原则有两条与政府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同样观点下的争论只能增添混乱。再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右翼分子公开鼓吹日本的道德教育、历史教育要摆脱战后远东军事法庭观点的束缚，用日本人自己的观点来重新评价那场战争，要大力宣扬日本的优点长处，让学生能够“挺起胸膛做人”。他们趁机鼓吹这些容易引起人们思想混乱的观点，就是利用了日本战后思想道德教育内容实质始终不明确的弊端。他们提出要发扬日本的优点长处，但是从来没有说明日本的优点长处是什么，应该发扬什么样的优点长处。这种避实就虚的鼓吹手段用意非常明显，那

^① 吴廷璠：《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8页。

就是要煽动人们起来否定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让学生再次接受“大和民族优秀论”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这种观点经常假借“日本民族特殊论”的外衣出现。而日本政府有时也用这样一些含混不清的概念来表示日本的民族精神,也使用一些意义不明确的概念来表明自己对传统、对那场战争的态度,就更容易引起日本国民思想上的模糊不清。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局面的结束,日本与被侵略过的国家,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相继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又导致了日本国际政治观念的新变化;同时,在国内,随着政局的不断动荡,日本政界的许多政见相左甚至敌对的政党和个人纷纷抛弃前嫌,握手言欢。政界党派的重新组合,自然会给思想界、教育界带来深刻影响。那么,日本思想道德教育领域中的具有实质性的争论就更难以出现了,而无聊的争吵则会越来越多。同样,日本人在思想道德教育中所接受的战争认知理念依然会模糊不清。

第三,战后教育方针与国民战争认知的关系。在美国政府和占领军司令部的指令下,日本当局通过制定《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确立战后教育方针:为了把日本建设成为“既有民主又有文化的国家,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福利事业做出贡献”,就必须“培养注重个人尊严并追求真理和爱好和平的人才”。所以,日本教育“必须完成以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作为和平的国家及社会的建设者,爱好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的价值,注重劳动与责任,充满独立自主精神的身心健康的国民”(《教育基本法》第一条)。可见,日本战后的教育方针是具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和尊重个人尊严与价值的美好理念的。日本战后教育也基本上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进行改革和向前发展的。然而,由于战后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迅速,以市场

经济为主要发展形式的现代社会使每一位日本国民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日本战后教育的实质上就是为了培养国民的竞争能力。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教育投资论”和“能力主义”的影响下,日本教育是把知识技能的传授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日本学生为了能够掌握迎接激烈竞争社会所需要的本领,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习知识技能上面。这样,如果政府对那场侵略战争没有明确的态度,没有正确的观点的话,日本学生很难主动去关注那已经过去了的战争。

第四,“历史教科书”问题对学生战争认知理念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曾多次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篡改。如将“侵略”改为“进入”、“进攻”,把南京大屠杀的起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等,以此掩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出现说明日本教育界的极右思潮与社会上的极右势力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其影响力已经能够左右教科书的编写,也说明日本政府,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文部省对极右势力采取了默认、纵容、支持的态度。

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虽然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坚决反对下又进行了纠正,但对日本广大学生的战争认知理念造成的影响是极为深远和恶劣的。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教科书故意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就会使日本学生不能正确认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不能正确认识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危害性放松警惕。其次,对历史教科书不负责任地任意篡改,就会使日本学生及国民产生一种不好的认识,那就是:教科书是任意编撰的,内容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这样,他们自然就会对教科书陈述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历史和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所犯下的战

争罪行的记录的真实性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再次，中日两国政府经常为这些历史问题产生争论、摩擦和矛盾，对不了解日本侵略历史和不关心历史的日本学生及国民来说，往往容易引起一种逆反心理。这会使得他们更加不愿意认识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

此外，日本教育管理的独立性特点与政府参与之间的矛盾，日本民主化、公平化教育思想与实际存在的教育不平等现象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学生及国民的战争认知理念也都有很大的影响。